

Tran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Xue Mo's Literary Works: Perspective of Yi-Translatology

SHI ZHOU Anjian XIN Hongjuan

Ningbo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February 18, 2025

Accepted: March 10, 2025

Published: June 30,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SHI ZHOU Anjian & XIN Hongjuan. (2025). Tran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Xue Mo's Literary Works: Perspective of Yi-Translatolog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2), 045–051, DOI: 10.53789/j.1653–0465.2025.0502.006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5.0502.006>

Abstract: The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s long confronted dual challenges: a unidirectional cultural narrative that limits resonance with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and the erosion of cultural significance across linguistic boundaries. This study applies *Yi-Translatology*—a translation framework rooted in the cosmological principles of *Yijing* (The Book of Changes)—to investigate its tripartite operational paradigm (streamlined transmission, adaptive transformation, and core preservation) as a solution to these cross-cultural barriers. Through a case analysis of Xue Mo's translated works, we demonstrate how *Yi-Translatology* employs context-sensitive textual reconfiguration and culturally calibrated mediation to reconcile cultural authenticity with dynamic adapt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is framework achieves equilibrium between cultural specificity and universality, effectively preserving the philosophical essence of source texts while facilitating intercultural dialogue.

Keywords: Yi-Translatology; Xue Mo; Chinese literature; outbound translation; global dissemination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SHIZHOU Anjian is an MTI student at the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His email is 1784335605@qq.com. XIN Hongjuan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with a research focus o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大易翻譯學視角下雪漠文學作品外譯與國際傳播剖析

施周安健 辛紅娟

寧波大學

摘要：中國文學在「走出去」與「走進去」的雙重進程中，長期面臨「對空言說」與「文化折扣」的傳播困境。本文以大易翻譯學理論框架為依託，通過解析「易之三義」（簡易、變易、不易）與中國文學外譯的深層關聯，系統考察該理論在雪漠文學海外傳播實踐中的指導效應。研究發現，大易翻譯學作為根植於本土的譯論，通過「以易傳文」的文本重構策略、「以易化人」的文化適應性轉化機制，嘗試破解跨文化認知隔閡，為中國文學全球傳播提供了方法論路徑。本文以雪漠作品譯介為案例，揭示中國傳統譯論如何借力經典哲學智慧，通過動態平衡文化異質性與可通約性，拓展本土文學的參與國際敘事的可能性路徑。

關鍵詞：大易翻譯學；雪漠；中國文學；外譯；國際傳播

一、引言

在全球化語境下，中國文學海外譯介是文化「走出去」的戰略需求，但從半個多世紀的實踐看來，依然面臨「走進去」的難題。跨文化對話的核心在於「如何認識「異」與對待「異」」（劉雲虹，2022：77）——這一命題直指翻譯活動中語言、文化、意識形態的多維張力。中國典籍《易經》所蘊含的「變通」哲學，為應對此類挑戰提供了理論資源。本文以雪漠文學作品譯介為研究對象，從「簡易」「變易」「不易」三重維度切入，探討《大易翻譯學》如何借「易之三義」構建翻譯方法論：通過「簡易」消解文化認知壁壘，經由「變易」實現敘事形式創新，依託「不易」堅守文化本體價值。研究旨在揭示中國傳統譯論與現代傳播需求的契合性，為中國文學突破「文化折扣」困境、建立有效的國際對話機制提供理論參照與實踐啟示。

二、大易翻譯學對「易之三義」的闡釋

大易翻譯學以《易經》哲學為理論內核，突破西方譯論範式束縛，開創本土譯論新路徑。作為中國本土翻譯理論的重要探索，大易翻譯學以《易經》「易之三義」為哲學根基，通過重新詮釋傳統經典，構建了一套立足中華文化本體的譯學理論體系。其核心在於將《易經》的「變通」哲學與翻譯研究的本質問題相結合，從形而上的哲學思辨延伸至翻譯實踐的形而下操作，形成「道器合一」的理論框架。

「簡易」即「簡單和容易」（陳東成，2017：17），強調通過符號系統的再編碼消解文化異質性。《系辭上傳》所言「易知則有親」，直指翻譯的認知疏通功能。賈公彥認為「譯者易也，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揭示翻譯本質是「換易言語使相解」的符號轉換行為。「簡易」的目的就是用最簡樸的方法處理好最複雜的問題，是關於如何化繁為簡、一解百解、執簡馭繁的方法論。從「簡易」的原理廣而推之，大千世界中越是複雜難懂的事物，便越是有著易知、易從的規律可循。翻譯也是如此。

「變易」即「變通」。《周易·系辭下》強調「唯變所適」，認為萬物皆處於永恆變動之中。大易翻譯學將這一哲學主張轉化為「變譯」理論，這正是對《易經》「變動不居」思想的實踐延伸。翻譯活動需根據目標語文化語境，靈活調整文本形態與敘事結構，例如通過母題重構、形式創新等手段，實現文化價值的適應性轉化。這種「變通趨時」的實踐，印證了「變化是翻譯本質屬性」（餘承法，2014:103），更凸顯大易翻譯學「以變求通」的方法論優勢，在動態調適中實現文化價值的適應性。

「不易」原則強調翻譯需在動態的語言轉換中堅守文化內核的恒定性。《管子·形勢》言「天不變其常」，強調變中有常的宇宙法則，揭示翻譯的本質是通過形式變化傳遞不變的文化內涵。譯者需在跨文化調適中錨定源語文本的價值根系，使其成為異域語境中的文化識別符。「不易」原則的本質在於將翻譯視為文化的再生系統，使翻譯實踐在「變」與「不變」的辯證運動中突破「文化折扣」，實現從單向輸出到價值共生的範式轉型。

該理論將「易之三義」融入翻譯研究，系統闡釋翻譯的本質、原理與方法論，構建「全域與局部相照應」的理論體系（趙彥春，2015:6）。其核心價值在於以「易」解「譯」，既承襲《易經》「變通」哲學精髓，又將翻譯研究從「器」的操作層面提升至「道」的本體論高度，為中國特色譯學話語體系注入原創性理論資源。

三、「易之三義」在雪漠文學譯介中的映射

大易翻譯學提出的「簡易」「變易」「不易」原則，不僅是對《易經》哲學的現代譯學轉化，更為中國文學外譯實踐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論框架。雪漠文學作品以其鮮明的西部地域文化特質與哲學深度，成為檢驗「三易」理論效力的典型樣本。其譯介實踐通過「符號轉換-形式重構-基因編碼」的三重路徑，系統呈現了「三易」原則從理論到實踐的映射邏輯。

（一）「簡易」之文化符號的認知疏通

「簡易」作為《大易翻譯學》的核心原則之一，其本質是通過文化符號的跨模態轉換實現認知可及性。「簡易」並非對文本的簡化或降維，而是遵循「易知則有親」的哲學邏輯，通過符號系統的再編碼消解文化異質性。譯者需在受眾導向下對源語符號進行選擇性重構，以適配目標語文化認知框架。

雪漠文學文本的獨特性體現為雙重張力：其一，題材上「貼著地面行走」的鄉土寫實性，使其作品深度嵌入涼州地域文化肌理（如民風民俗、方言體系）；其二，風格上「將自己打碎」的敘事實驗性，使其語言呈現高度隱喻化的西部美學特徵。這種雙重特質雖賦予文本強烈的文化辨識度，卻同時構成跨文化傳播的認知屏障。依據「共通意義空間」理論（郭慶光，2011:10）的，傳播效度依賴於傳受雙方對符號意義的共用闡釋。若源語文化符號無法在目標語認知體系中找到對應錨點，造成文本意義的耗散。

譯者通過「簡易」策略實現了文化符號的轉換。一、實物符號的類比置換：如將西北主食「饅饅」譯為「flatbread」，借助形狀與功能的相似性建立認知映射，既保留飲食文化的物質屬性，又規避因文化缺省導致的語義真空；二、語言符號的語義重構：西北歇後語「蠍虎子挨鞭子，死挨吧」承載著方言特有的戲謔性與悲劇性雙重意涵，直譯可能導致目標讀者誤讀。譯者將其簡化為「It's not good」，雖犧牲部分修辭色彩，卻通過核心語義提取確保敘事連貫性；三、哲學概念的語境重置：佛教術語「看破紅塵」在中文語境中隱含「超脫世俗」的宗教哲思，但直譯為「to see through the vanities of the world」易引發基督教文化背景讀者的倫理誤判。譯者採用歸化策略譯為「turned their back on this world」，通過西方宗教話語中的「出世」意象實現概念等效（Nida, 1964）。

上述實踐揭示「簡易」策略的雙重功能：一方面，其與交際翻譯理論強調的原則具有共性，均主張通過語



言調整提升可接受性(Newmark, 1988);另一方面,大易翻譯學的「簡易」更注重文化主體性的動態平衡——如莉莉亞娜(Liliana)、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等譯者在歸化過程中並未完全消解源語文化特質,而是通過符號置換構建「第三空間」(Bhabha, 1994),使西部方言的陌生性轉化為可闡釋的文化他者。這種策略印證了《易經》中「以易馭繁」的翻譯哲學:在降低認知負荷的同時,通過符號留白激發目標讀者的文化想像,從而實現「減形增蘊」的傳播效果。

雪漠文學海外傳播案例表明,「簡易」策略的成功實施依賴於譯者對雙重文化系統的深度把控。其不僅需要精準識別源語文本中的文化專有項,更需在目標語符號庫中篩選最佳適配載體。這種跨文化闡釋能力,恰是破解中國文學「對空言說」困境的關鍵所在。

(二)「變易」之敘事母題的適應性轉化

「變易」作為《大易翻譯學》的核心方法論,強調通過動態調整實現文化的有效傳遞。黃忠廉提出的「變譯理論」將「變通」界定「為靈活地對譯文做出非原則性的變動」。變通包括增、減、編、述、縮、並、改、仿這八大變通手段(黃忠廉, 2009:98),其本質是以受眾需求為導向的適應性策略,與《周易·系辭下》「變通者,趣時者也」的哲學主張形成理論呼應。二者的協同作用,為雪漠文學海外譯介提供了「形式創新-意義守恆」的雙重保障機制,其在具體實踐中體現為互文性仿寫和敘事重構。

通過互文性仿寫,敘事母題形成了跨文化映射。「仿」作為變譯的核心手段之一,需以源語文本與目標語文化系統的互文關聯為基礎。互文性理論指出,文本意義的生成依賴於與其他文本的隱性對話。《沙漠的女兒》英譯本標題「Into the Desert」對勒克萊齊奧《沙漠》(Désert)的借鑒,正是通過「出走-反叛-回歸」母題的互文投射,啟動西方讀者對女性解放敘事的集體記憶。這種策略不僅規避了直譯「沙漠的女兒」(Daughter of the Desert)可能引發的東方主義凝視(Said, 1978),更通過母題共振「營造了熟悉感和親近感」(辛紅娟、費周瑛, 2023)。雪漠作品中「逃離父權制-沙漠歷險-回歸宿命」的三段式結構,被重構為「個體覺醒-社會抗爭-人性回歸」的普世敘事框架,印證了《易經》中「以易趨同」的譯介邏輯——在形式嬗變中實現文化價值的可通約性。

通過敘事重構,鄉土敘事經歷了普世性升維。「編」的變譯策略要求譯者突破文本物理形態的限制,進行深度意義再生產。變通手段通過編選、編寫、編排等策略,依主旨需要重新組織材料,使內容集中化,內容單一化,為翻譯傳播的目的服務。《大漠三部曲》由三部具有互文關係的小說組成,而《沙漠的女兒》則充分利用了「編」的變通手段,對「三部曲」中的故事進行了編寫。譯者通過雙重敘事重構,將分散的西部鄉土經驗提煉為具有全球意義的女性主義文本;主線敘事聚焦《白虎關》中蘭蘭、瑩兒的沙漠取鹽經歷,通過「勇鬥豺狼」場景的戲劇化呈現,塑造「荒野女性」的英雄形象;副線敘事整合《大漠祭》與《白虎關》的苦難記憶,以閃回手法揭示父權制對女性身體的規訓,形成「壓迫-覺醒-反抗」的批判性敘事弧。這種編選策略通過文本系統的內部自洽,將地域性經驗轉化為「可普遍化的交往媒介」。譯者在消解西部地理特殊性的同時,強化了「生存抗爭」與「性別平等」的超文化價值,使文本適配當代語境下的全球女性主義話語。

《文心雕龍·時序》所言「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於時序」,揭示文學形式與時代語境的共生關係。這一古典文論思想在雪漠文學譯介中轉化為「變易」策略的實踐智慧:通過敘事重構與形式創新,中國文學外譯既需回應全球文化流動的歷時性需求,亦需堅守本土文脈的共時性特質。

(三)「不易」之鄉土價值的跨文化再生

文學走向世界的途徑到底「是通過與世界文學的認同而向其靠近,即通過謀取與世界文學的共性走向世界,還是立足於本土以自己與世界文學的差異走向世界」(張衛中, 1991:81),這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嚴肅的



問題。「共性認同」與「差異立足」之辯，實則觸及當代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關鍵問題：文學外譯究竟應消弭文化異質性以迎合全球市場，抑或堅守本土特質以彰顯文化主權？福克納、馬爾克斯、莫言等作家的成功實踐，雄辯地證明了地域上的限制不會讓作家目光狹窄，反而能夠讓作家通過有限的空間觀照更廣大的世界，印證了地域性敘事通過具體時空的濃縮反能生成普世意義。雪漠文學海外傳播的成功進一步驗證了地域性敘事的重要性。

在語言層面，雪漠作品譯本通過「異化主導」策略，對文化基因進行編碼，構建了雙重文化錨點。譯者使用直譯保留了物質文化符號，如「天窗裏吊苜蓿，給老驢種相思病」譯為「hanging bunches of lucerne in their courtyards made donkeys love-sick」，通過農耕意象的跨媒介再現，將涼州民居的物理空間轉化為文化記憶的儲存裝置；通過方言修辭的陌生化移植，將「蒼蠅攆屁」譯為「as elusive as flies' fart」，「跟載了死人出莊門的棺材一樣」譯為「as remorselessly as the coffins that bore the bodies of the dead from the village」，西北方言修辭中的荒誕美學提升了雪漠作品在國際傳播中的辨識度。對不可譯性的創造性轉化，即規避了歸化策略的文化損耗，又通過注釋、語境補償等手段實現認知可及性，在「抵抗」與「溝通」間達成動態平衡。

在敘事結構層面，雪漠作品通過空間固化、母題迴圈與意象複現的三重機制，系統強化了文化主體性的本土再生產。作品始終以涼州地理單元為敘事容器，其封閉性空間建構與馬孔多、約克納帕塔法世系和高密有異曲同工之妙，通過微觀宇宙的具象化映射人類生存的普遍困境；而「求生抗爭-宿命回歸」的敘事模式則暗合《周易》的哲學迴圈，將西北地域經驗昇華為具有超文化意義的存在主義命題。在符號表徵層面，大漠、駱駝、沙暴、狼群等西部意象的反復書寫建構起獨特的審美認知範式，使地域性敘事昇華為文化認同的象徵體系。譯者在處理這些文化基因時，與「不易為體，變易為用」的翻譯原則暗合，既完整保留了敘事的地方肌理，又借助人類共通的生命體驗啟動目標讀者的情感共鳴，從而在文化守成與傳播效能間達成動態平衡。

雪漠文學作品走向世界的過程符合《易經》中所提倡的「動靜結合，陰陽交感」之說。動態的編寫和翻譯始終立足於恒定的鄉土敘事基礎之上，而靜態的鄉土視野也在翻譯傳播的過程中逐漸延伸向整個中國的鄉土，乃至整個世界，形成了廣受好評和歡迎的海外譯介作品。世界潮流變換更迭，只有紮根土壤的文學才能具有永恆的生命力。「文學作品通過一時一地的地方性敘事來呈現大時代下的生活流變，通達人類共通的認知情感」（楊建新，2023），雖然順應時代是中國文學「走出去」、「走進去」的必要條件，但是若其內核脫離了中國的土壤則會讓作品本身淪為無根的浮萍。唯有通過「不易」，堅持還原和複現文學作品中的鄉土情結，才能讓中國文學作品深入人心，以厚重的力量紮根世界文壇。

四、「易之三義」對中國文學外譯的啟示

雪漠文學海外傳播的成功實踐，不僅驗證了大易翻譯學「易之三義」原則的有效性，更為中國文學外譯提供了普適性方法論啟示。中國文學外譯作為跨文化傳播的核心實踐，需在全球化語境中實現文化價值的有效傳遞。

（一）「簡易」與文化認知的普適化路徑

文化符號的跨語境傳播需以「簡化複雜性」為核心邏輯。外譯需通過符號簡化與語境適配，降低文化核心意象的認知門檻。其本質是剝離冗餘複雜性，提煉文化符號的「最大公約數」，在目標語境中建立可通約性。例如，通過「雙向闡釋」策略（如核心概念的本土化注解）或「詩學規範融合」（如敘事結構的跨文化重構），實現文化意義的平滑傳遞。此過程需遵循目標文化的接受邏輯，規避因異質性過強導致的接受阻抗。



但簡化符號並非消解文化獨特性,而是通過策略性調和實現「可讀性」與「辨識度」的平衡。歸化策略可降低接受門檻,但過度歸化易導致文化趨同,消解文化獨特性。因此,譯者需通過動態評估目標語境,在「文化保真」與「認知疏通」間尋求最優解。在動態評估過程中,可以根據目標文化的接受意願決定歸化與異化的權重分配:在文化勢差顯著時,歸化優先;在文化平等對話中,異化可增強文化主體性(張南峰,2015:91)。

(二)「變易」與敘事策略的動態調適機制

文學外譯的核心挑戰在於將本土敘事母題轉化為具備跨文化共鳴的普適性主題。這一過程需通過「母題解構—重構」策略,剝離文化特定性外殼,提煉人類共通的情感與價值內核。例如,劉慈欣《三體》中的「黑暗森林法則」雖植根於中國科幻語境,但其對文明衝突與生存危機的探討,與西方科幻的「末世敘事」「技術倫理」等母題形成深層呼應。此類昇華並非簡單類比,而是通過隱喻移植實現母題的語義擴容,使其突破地域限制,成為全球讀者可共用的敘事資源。

跨文化敘事學認為,母題普適性依賴於「文化元語言」的識別與重構(Lotman,1990)。例如,中國鄉土文學中的「落葉歸根」母題,可通過「身份認同」這一元語言轉化為移民文學中的「尋根敘事」,從而在歐美元文化語境中引發共鳴。具體操作中,譯者需充當「文化拓撲學家」,對母題進行拓撲變形:先挖掘母題中的人性共性,再將其嵌入目標文化的敘事傳統。

此外,可系統梳理中西文學母題的對應關係,為轉化提供理論依據。例如,道家「天人合一」思想可與西方生態主義對話,轉化為「生態整體論」敘事,在氣候危機議題中啟動其當代意義。

(三)「不易」與文化本體的價值守恆原則

文化本體的守恆並非機械複製,而是通過創造性重構實現價值再生。例如,儒家「仁」的概念在譯入英語時,可結合西方美德倫理學轉化為「Humaneness」,既保留「愛人」的倫理內核,又融入目的語的哲學話語體系。此類轉化需避免「文化折衷主義」,即犧牲核心價值以迎合外部期待。譯者應充當文化闡釋者,通過副文本闡明源文化的語境邏輯。翻譯的使命在於「啟動原作在異域的新生命」,而非單向移植符號。以《紅樓夢》中「禮」的複雜社會網路為例,譯者需通過語境化闡釋(如對比歐洲貴族禮儀制度)揭示其倫理功能,而非簡單譯為「ritual」導致語義窄化。

外譯實踐中,核心價值的再生必須以文化自省為倫理基礎,否則可能陷入「自我東方化」或「文化霸權」的雙重陷阱。自我東方化表現為刻意渲染文化奇觀以迎合異域想像,如將「中國性」簡化為功夫、旗袍等刻板符號;文化霸權則體現為忽視目標文化主體性,強行輸出價值觀。文化自省需承認經濟實力與文化影響力的非同步性,警惕將「輸出」等同於「征服」。例如,在《論語》譯介中,若將「君君臣臣」直接轉化為「hierarchical obedience」,可能強化西方對儒家倫理的威權主義誤讀;反之,結合社群主義理論闡釋其「角色倫理」內涵,則能建立平等對話空間。

「易之三義」框架從認知普適、策略調適與價值守恆三重維度,為中國文學外譯提供了兼具哲學深度與實踐張力的理論模型。通過符號簡化實現文化通約、通過動態適配啟動敘事活力、通過價值守恆維護文化根性,中國文學外譯可超越語言轉換的技術層面,成為文明互鑒的活性載體。這一模型不僅回應了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傳播挑戰,也為構建「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學生態貢獻了中國智慧。

五、結語

雪漠文學海外傳播的成功實踐,印證了《大易翻譯學》「易之三義」對中國文學外譯的理論指導價值。

「簡易」通過符號轉換消解文化認知壁壘,「變易」借動態調適實現敘事形式創新,「不易」以文化基因編碼堅守本土價值內核,三者共同構建了「體用合一」的譯介機制。研究表明,《易經》「變通」哲學不僅為破解「文化折扣」困境提供了方法論支撐,更通過「守正創新」的路徑,使地域性敘事升維為超文化命題。中國文學外譯研究需進一步挖掘傳統譯論與現代傳播的契合點,在「取今復古,別立新宗」(魯迅,2005:58)的學術自覺中,推動本土話語與全球視野的深度融合。唯有將易學智慧與翻譯實踐系統貫通,方能在文明互鑒的語境下,開闢中國文學「走出去」且「走進去」的可持續路徑。

參考文獻

- ① Bhabha, Homi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② Lotman, Yuri M. (1990). *Universe of the mind: 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 London: I. B. Tauris.
- ③ Nida, Eugene A.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Leiden: Brill.
- ④ Newmark, Peter. (1988).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New York: 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 1988.
- Said, Edward W. (1978).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⑤ Xue Mo. (2021). *White tiger pass*. Howard Goldblatt & Sylvia Li-chun Lin. Hong Kong: Zhonghua International Media Publishing Group.
- ⑥ Xue Mo. (2018). *Desert rites*. Howard Goldblatt & Sylvia Li-chun Lin. Hong Kong: Zhonghua International Media Publishing Group.
- ⑦ Xue Mo. (2018). *Desert hunters*. Trans. Howard Goldblatt & Sylvia Li-chun Lin. Hong Kong: Zhonghua International Media Publishing Group.
- ⑧ Xue Mo. (2022). *Into the desert*. Trans. Howard Goldblatt & Sylvia Li-chun Lin. San Francisco: Long River Press.
- ⑨ 陳東成:《大易翻譯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頁17。
- ⑩ 方夢之:《翻譯大國需有自創的譯學話語體系》,《中國翻譯》,2017年第5期,頁100。
- ⑪ 黃忠廉:《翻譯方法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頁95-98。
- ⑫ 郭慶光:《傳播學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頁10。
- ⑬ 劉雲虹:《對話與共生——試析許鈞關於中華文化譯介的思考》,《外國語》,2022年第4期,頁72-80。
- ⑭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頁58。
- ⑮ 戚偉燕:《中國傳統譯論的命題類型》,《民族翻譯》,2023年第6期,頁23-30。
- ⑯ 辛紅娟,費周瑛:《〈沙漠的女儿〉女性敘事及跨語際重構路徑》,《中國社會科學報》,2023年A04版面。
- ⑰ 雪漠:《白虎關》,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7年版。
- ⑱ 雪漠:《大漠祭》,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7年版。
- ⑲ 雪漠:《獵原》,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7年版。
- ⑳ 楊建新:《中國文學外譯中地域性書寫的認知重構——以雪漠短篇小說〈新疆爺〉英譯為例》,《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6期,頁117-124。
- ㉑ 易正天:《易經的智慧閱讀》,北京:西苑出版社,2009年版,頁93。
- ㉒ 餘承法:《從全譯之「化」看變譯之「變」》,《外語學刊》,2014年第1期,頁99-103。
- ㉓ 趙彥春:《序言》,載陳東成:《大易翻譯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頁6。
- ㉔ 張衛中:《論福克納與馬爾克斯對莫言的影響》,《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91年第1期,頁79-83。
- ㉕ 張南峰:《文化輸出與文化自省——從中國文學外推工作說起》,《中國翻譯》,2015年第4期,頁88-93。

(Editors: Derrick MI & Joe ZHANG)